

大同辽墓壁画人物服饰再析^{*}

王春燕

内容提要 山西晋北大同地区长期处于游牧与农耕区的交锋缓冲地带，文化面貌上极其复杂，在宋辽南北对峙阶段，在不同文化因素的交织下，该地区形成了地域特征极为明显的墓葬体系，其丰富的信息亦在墓葬壁画中有所体现。本文试图以人物服饰为切入点，运用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壁画简报、图录中的服饰元素进行辨析、分解、组合，进而对八类着衣人群的民族、时代和等级进行探讨，并与邻近地区进行对比，以期获得对辽代大同地区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面貌的整体性认识：以汉服为主流，其他服饰元素共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理念也在此阶段有所体现。

关键词 大同辽墓 壁画人物服饰 整体性面貌

随着近年来辽代墓葬壁画资料的日益丰富，其区际面貌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同为辽西京道管辖下的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地区）和归化州（今河北宣化地区）的服饰情况就不尽相同。据发掘者介绍，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约有20例^①，除画面模糊不清和资料未公开发表者^②之外，本文收录的资料有16例，集中分布在大同市西南郊，包括南关M2、五法村墓、卧虎湾M1、M2、M4、M5、M6、西环路M1、十里铺M27、M28、新添堡M29，以及周家店、许从赆墓、东风里、机车厂、铁路生活区的辽墓。关于大同辽墓壁画人物服饰的研究，韩心济等学者已做过专门研究^③。本文将基于对《中国墓室壁画全集》《中国出土壁画全集》以及考古发掘报告等材料的梳理、辨析、分解、组合，尽量全面系统地对这一地区的服饰状况再次探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本文系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辽代服饰研究”（项目编号：22HQ13）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的元代服饰研究”（项目编号：22BKG029）研究成果。

① 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42页。

② 山西大同市东郊马家堡辽墓就存在壁画模糊不清的情况，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铁十七局院、煤气公司气源厂等地的数座壁画墓资料未发表。

③ 韩心济《辽墓壁画人物服饰探析——以大同地区发掘墓葬为例》，《文物世界》2017年第1期，第21—23页。

壁画人物服饰分类

(一) 发式、头衣

1. 髡发

根据髡发的形态，可分为髡发散落和髡发挽结两种类型，详见[表一]。

[表一] 髡发的类型

类型	A型 髡发散落		B型 髡发挽结	
	Aa型	Ab型	Ba型	Bb型
特征	留额发、鬓发、顶发，顶发扎系，其余剔除	额发留少许，呈“人”字形，鬓发散落，呈蝌蚪状	额发剔除，顶发留一撮，两绺鬓发在头两侧束成骨朵样	只有额发剪为短刘海，鬓发散落，其余头发在头顶或两侧束成骨朵样
墓例	东风里辽墓北壁2例〔图一：1〕 卧虎湾4号辽墓北壁、东壁2例	机车厂辽墓东北壁1例〔图一：2〕	卧虎湾4号辽墓西壁3例	机车厂辽墓西北壁1例〔图一：3〕 西环路M1有1例

2. 髻发

根据髻发的形态分为单髻、包髻、花饰髻、双髻等类型，详见[表二]。

[表二] 髻发的类型

类型	A型 单髻	B型 包髻	C型 花饰髻		D型 双髻	
			Ca型	Cb型	Da型	Db型
特征	头顶高耸以布带结扎成髻，髻的形状略有差异	髻发用布包裹，前面装点饰品	以整体花冠装饰髻发	以布带或饰品装饰髻发	双髻在头顶上方	双髻在耳朵两侧
墓例	许从赧墓9例〔图一：4〕 周家店辽墓3例	东风里辽墓1例〔图一：5〕	东风里辽墓1例〔图一：6〕	西环路M1 2例〔图一：7〕 东风里辽墓1例	机车厂辽墓1例〔图一：8〕	机车厂辽墓1例 卧虎湾M6 4例 十里铺M27 2例 十里铺M28 3例 西环路M1 1例〔图一：9〕

3. 幞头

根据幞头双脚的形态，可分为交脚、弓脚、展脚、无脚四种类型，详见[表三]。

[表三] 幞头的类型

类型	A型 交脚	B型 弓脚	C型 展脚	D型 无脚
特征	两脚上翘向后交叉	两脚下弓，又称“局脚”	两脚平直	两脚消失
墓例	东风里辽墓5例〔图一：10〕 铁路生活区辽墓1例	许从赧墓1例〔图一：11〕 周家店墓2例	许从赧墓2例〔图一：12〕 东风里辽墓2例 周家店墓4例	东风里辽墓2例

4. 帽

根据帽的形态和材质，可分为软帽、毡帽、系带帽、高檐帽、笠帽五种类型，详见[表四]。

[表四] 帽的类型

类型	A型 软帽	B型 毡帽	C型 系带帽	D型 高檐帽	E型 笠帽
特征	帽顶束成单独的骨朵，骨朵倾斜显示出帽子质地的柔软	线条明朗简约，无褶皱	帽额前有两条细带系结	帽檐高耸，时人称“东坡巾”	圆檐斗笠形帽，顶立火焰形金属饰
墓例	十里铺M27 1例〔图一：13〕 十里铺M28 1例	东风里辽墓1例〔图一：14〕	东风里辽墓2例〔图一：15〕	东风里辽墓1例〔图一：16〕 西环路M1 1例	东风里辽墓1例

(二) 襦袍、裙裤

1. 襦

襦，一般指长不过膝的短衣，《说文解字》称“襦，短衣也”。根据衣长和袖子的特点，可分为短襦、长襦两种，详见[表五]。

[表五] 襦的类型

类型	A型 短襦	B型 长襦	
		Ba型	Bb型
特征	交领，广袖，领口有襷，从扎进高腰裙的细节推测为短衣	交领，窄袖，胸部扎带，飘带垂落，俗称团衫	对襟，广袖，不扎带，自然垂落，俗称褶子
墓例	许从赆墓8例 周家店墓9例[图一：17] 十里堡M27 2例	东风里辽墓3例 [图一：18]	周家店辽墓2例

2. 袍

袍具有整体性，通常与裤搭配。根据长度和开气的位置，可分为短袍、中长袍、长袍三种类型，详见[表六]。

[表六] 袍的类型

类型	A型 短袍	B型	C型 长袍
特征	圆领，长至膝盖，露出鞋靴，筒袍，通常两侧不开气	圆领，筒袍，长至腿肚	圆领，两侧开气，长至脚踝
墓例	东风里辽墓2例[图一：19] 铁路生活区辽墓1例 五法村辽墓1例	五法村辽墓1例 南关M2 3例 机车厂辽墓1例	机车厂辽墓1例 卧虎湾4号辽墓3例 东风里辽墓10例[图一：20] 许从赆墓2例 周家店辽墓6例

3. 裙

根据裙的长度，可分为及踝裙、拖地裙两型，详见[表七]。

[表七] 裙的类型

类型	A型 及踝裙			B型 拖地裙
	Aa型	Ab型	Ac型	
特征	长裙密褶	长裙内外层叠错落	长裙呈筒状	裙摆拖在地面上，看不到鞋子
墓例	东风里辽墓2例 [图一：21] 十里铺M27 2例	东风里辽墓1例 [图一：22]	西环路M1 1例 [图一：23]	许从赆墓8例 周家店辽墓9例[图一：24]

4. 裤

由于袍服较长，很多人物看不到裤装的具体情况，只有在与短袍组合出现时能观察到几例窄腿裤。十里铺M27有1例，东风里辽墓的2例有裹腿、1例着靴，卧虎湾M4有1例托举重物者。

(三) 鞋履、靴

1. 鞋履

根据其样式分为草鞋、布鞋、履四种类型，详见[表八]。

〔表八〕 鞋履的类型

类型	A型 草鞋	B型 布鞋		C型 履	
		Ba型	Bb型	Ca型	Cb型
特征	有编织的痕迹，或为麻鞋	两侧开V型口	鞋帮较矮，两侧不开口	方头	尖头
墓例	东风里辽墓2例 〔图一：25〕	许从赟墓2例 〔图一：26〕	东风里辽墓2例	东风里辽墓1例 〔图一：28〕	东风里辽墓1例 〔图一：27〕

〔图一〕发式与冠帽、襦袍与裙裤、鞋履与靴

1、20. 东风里辽墓北壁男侍 2. 机车厂辽墓东北壁男侍 3. 机车厂辽墓西北壁男侍
4. 许从赟墓西南壁燃灯侍女 5、6、18、21、29. 东风里辽墓北壁侍女 7、23. 西环路M1西壁侍女
8. 机车厂辽墓西北壁侍女 9. 西环路M1西壁侍女 10、29. 东风里辽墓北壁乐人
11、12、26. 许从赟墓的守门侍官 13. 十里铺M27门卫 14. 东风里辽墓西壁牵驼人
15、25. 东风里辽墓西壁牵马人 16. 东风里辽墓南壁门卫 17、24. 周家店辽墓西南壁燃灯侍女
19. 东风里辽墓西壁托帽男侍 22、28. 东风里辽墓南壁持扇侍女 27. 东风里辽墓北壁持扇侍女
3、4、8、11、12、17、24、26采自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126-128页；
15采自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第47页。其余为依据简报绘制



2. 靴

黑色乌皮靴，翘尖，靴筒较窄。东风里辽墓有6例〔图一：29〕。

二 壁画人物服饰组合的探讨

发式、首服、身衣、足衣等服饰的特定搭配与不同组合，通常是某个民族审美取向和生活情趣的外显与表达，研究服饰的组合，能够管窥大同不同身份人群的构成。大同辽墓壁画所

见服饰，根据组合特征可分为八类：

A类：A型软帽/B型毡帽/C型系带帽/A型交脚幞头+A型短袍+A型草鞋/黑色乌皮靴

仅见于东风里辽墓西壁的牵驼人〔图二：4〕、牵马人〔图二：1〕及同图中马后的托帽男侍〔图二：2〕，铁路生活区辽墓壁画中的牵马者〔图二：3〕和牵驼者，五法村辽墓壁画中的牵马人、十里铺M28西壁的牵马人。

该类为男子服饰组合，在大同地区并不常见，使用主体为鞍马和驼车的驾驭者。这类人物服饰所在的整幅图像主题一般为出行图，其中的马具有头小、颈长、后大的特点。据学者研究，这些都是辽马的

典型特征，郭雍在《番马图》跋中称之为“改马”^①，额辔和马具的装扮也完全符合契丹人的审美标准。驼车在长城以北契丹腹地的壁画中比比皆是，亦是极富契丹特征的文化符号。这种出行图是汉人聚集区中受契丹文化影响最显著的一类，可能是墓主人对过往生活的局部再现，或是对契丹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向往。人物服饰中帽子的特征较为突出，牵驼人的毡帽在通辽库伦辽墓壁画〔图二：5〕、赤峰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都出现过，系带黑帽在长城以北地区普遍使用〔图二：7、8〕，在温差较大、风沙较强的北方草原地区，帽子更具实用性。短袍为契丹传统男服中比较典型的一类，裹腿草鞋〔图二：7〕、黑靴〔图二：8〕也不是大同地区晚唐五代以来的汉族传统服饰，应都纳入契丹服饰系统的范畴。故可推测，这些人物可能是从契丹腹地交流到西京大同府的契丹人，驼车、鞍马驾驭者可能归属于与契丹人有亲缘关系的或契丹文化情结较重的汉人男子。

B类：A型、B型髡发+B型中长袍/C型长袍+ Bb型布鞋/靴

见于机车厂辽墓西北壁的“牛哥”〔图三：2〕和东北壁的男侍，卧虎湾M4北壁的男侍、东壁宴饮图和西壁宴饮图中的男侍，东风里北壁站立的2位男侍〔图三：3〕，西环路M1东壁的男侍〔图三：1〕、卧虎湾M6的侍卫、五法村辽墓墓门西侧的骨朵侍卫、南关M2的3位侍女。

该类以男子服饰组合为主，也有女扮男装的现象。作为男服，髡发特征明显，使用主体为不同场合的侍者，除“牛哥”的装束搭配了中长袍、裤靴之外，其余多与及地长袍和单鞋搭配使用，而非契丹族的传统短袍或中长袍。故从族属上推测，这类人群极可能是汉化的契丹人，仅保留了最具标识性和稳定性的发式——髡发；女子着男服的发式易为双髻或单髻，圆领及长度到达腿肚正是契丹男服的典型特点。

〔图二〕A类服饰组合

1. 东风里辽墓西壁牵马人 2. 东风里辽墓西壁托帽男侍
 3. 大同铁路生活区辽墓牵马人 4. 东风里辽墓西壁牵驼人
 5. 库伦M1辽墓男侍 6. 库伦M1辽墓牵马人 7. 巴林左旗前进村辽墓男侍 8. 韩家窝铺村辽墓男侍
- 1、2、4均采自前揭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第47页；
3采自前揭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卷》，第132页；
5-8采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建华编著《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5、217、127、203页



① 曹星原《传胡瓌〈番马图〉作者考略》，《文物》1995年12期，第85页。

〔图三〕B类服饰组合

1. 西环路M1东壁男侍 2. 机车厂辽墓东北壁男侍 3. 东风里辽墓北壁男侍
1采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2期，第53页；
3采自前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第48页；2采自前揭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第127页



1

2

3

〔图四〕C类服饰组合

1. 2. 许从赙墓北壁两侧的守门侍官 3. 许从赙墓墓门东侧的守门侍官
4. 周家店墓墓门西侧“收财帛图”中的2位侍官 5. 周家店墓北壁的2位守门侍官
1、2采自前揭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第126页。3-5为依据简报绘制



1

2

3

5

C类：B型弓脚幞头/C型展脚幞头+B型

长袍+C型布鞋

见于许从赙墓墓门东侧的守门侍官〔图四：3〕、北壁两侧的守门侍官〔图四：1、2〕，周家店墓墓门西侧“收财帛图”中的2位侍官〔图四：4〕、北壁的2位守门侍官及西北角“待客图”中的2位侍官〔图四：5〕。

该类为男子服饰组合，大胆运用了桔黄色彩，单鞋的款式也很特别，使用主体为侍官。这类服饰的特点是长袍广袖且两侧开叉，结合叉手礼判断，这种组合可能是西京大同府汉人官服形制的一种。

D类：A型交脚幞头/D型无脚幞头/D型

高檐帽/C型展脚幞头+B型长袍+黑色乌皮靴

见于东风里辽墓东壁人物5位侍者〔图五：1〕、南壁的门卫〔图五：3〕、鎏金铜押印上的人物〔图五：2〕以及墓主人彩绘石雕上的服饰；卧虎湾M2西壁宴饮图中的两位侍官、东壁散乐图中的8位乐人。

该类为男子服饰组合，使用主体在同一墓中有墓主人和侍者。这类服饰在西京地区非常普遍，是宣化辽墓中男子的主流服饰〔图五：4〕，腰带为看带，环绕两圈形成双带，属于典型的汉式腰带；无脚幞头仔细观察有两根软带，系于幞头前方。简报推测，东风里辽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身份及宗教信仰的汉人^{〔1〕}，故此组合应属于典型的汉服系列。

E类：A型单髻+A型短襦+B型拖地裙

见于机车厂东壁侍女、许从赙墓墓门西侧的燃灯侍女、东壁的守门侍女〔图六：1、2〕和东北、西北角的6位侍女；周家店墓墓门东侧的燃灯侍女〔图六：3〕，由于画面模糊不清，整体上感觉东壁和西壁中的8位侍女着装与燃灯女子基本相同；南关M2甬道口西侧的2位侍女，从线图观察与此类接近。

〔1〕 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第54页。

该类为女子服饰组合，使用比较普遍，鞋子被长裙遮挡几乎看不到，使用主体多为燃灯侍女，也有备膳侍女。这类服饰中发髻用布带固定，短襦与裹胸长裙搭配，并常见飘带，裹胸长裙颇有晚唐五代的遗风。

F类：B型包髻/Ca型花冠髻/Cb型花饰髻 +Ba型长襦(团衫)+A型长裙+C型履

仅见于东风里辽墓北壁壁画中的2位侍女〔图七：1〕、南壁持羽扇的门卫侍女〔图七：2〕。

该类为女子服饰组合，使用并不广泛，裙子为及踝双层裙，能看到鞋子的样式，穿着主体均为侍女。这类服饰中，长襦衫过膝，与及踝褶裙错落搭配，腰间扎束花结。这种装束并不多见，因为其既包含契丹腹地团衫的样式，又接受了北宋襦裙的间接影响，在宣化地区墓葬群的晚段壁画服饰中能见到相似者〔图七：3〕。花冠是典型的宋文化因素^①，在山西南部北宋墓中经常出现〔图九：4〕，属于汉服元素。

G类：D型双髻/Cb花饰髻+A型短襦+A型及踝裙

见于西环路M1南壁的侍女、西壁的2位侍女〔图八：1〕，十里铺M27北壁的2位侍女〔图八：2〕，十里铺M28

〔图五〕D类服饰组合

1. 东风里辽墓乐人 2. 东风里辽墓押印人物 3. 东风里辽墓门卫 4. 宣化辽墓M5前室东壁散乐图
1-3采自前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第49、53、47页；
4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下）》文物出版社，2001年，彩版七二



〔图六〕E类服饰组合

1、2. 许从赞墓墓门两侧的守门侍女 3. 周家店墓墓门东侧的燃灯侍女
4. 太原市焦化厂唐墓侍女 5. 传南唐周文矩《宫中风》中女子
6. 传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女子 7. 大同徐龟墓西壁侍女
8. 山西绛县城内村金墓侍女 9. 山西屯留县康庄村2号元墓侍女
1-4、7-9采自前揭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卷》，第103、125、128、147、186、200页；
5、6采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0、462页



① 北宋大都市妇女特别重视花冠，这与当时社会养花、戴花的风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佩戴时令真花外，一般还经常使用花冠。这些花冠多用各色罗绢或通草做成，讲究者加金、玉、玳瑁、珠子。这种花冠兴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20—521页。

〔图七〕F类服饰组合

1. 大同东风里辽墓北壁画中两位侍女 2. 大同东风里辽墓南壁持羽扇的门卫侍女
3. 宣化辽墓M5后室西南壁持盂侍女 4. 宣化辽墓M4后室东北壁捧盒侍女
1-2采自前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第48、47页；
3-4采自前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彩版七八、彩版九四



〔图八〕G类服饰组合

1. 大同西环路M1辽墓西壁的侍女 2. 十里铺M27辽墓北壁的2位侍女
3. 宣化辽墓M10前室东壁持盂女子 4. 宣化辽墓M7后室西壁燃灯侍女
1采自前揭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第50页；
2采自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1960年第10期，图版五；
3-4采自前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彩版五、彩版三五



〔图九〕H类服饰组合

1. 周家店辽墓 2. 山西汾阳市东龙观村金墓M5启门女子
3. 山西绛县城内村金墓 4. 山西平定县城关镇姜家沟村北宋墓乐人
1-4分别采自前揭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卷》，第129、163、187、120页



西壁出行图中的侍女、北壁围屏两侧的2位侍女，卧虎湾M2西壁出行图中的侍女、东壁散乐图中的侍女、北壁的侍女，卧虎湾M6东壁的侍女、新添堡村M29西壁宴饮图中的侍女。

该类为女子服饰组合，在多个墓葬及各墓室单元里具有普遍性，使用主体均为侍女。此类组合的发式较为特殊，双髻发式的女子年龄较小；短襦衫和褶裙的组合搭配与宣化地区墓葬群的早段壁画服饰〔图八：3、4〕存在交流，是不同区域汉族人群之间交流的体现。

H类：A型单髻+Bb型长襦(褙子)+B型拖地裙

仅见于周家店辽墓备茶图中的2位侍女〔图九：1〕。

该类为女子服饰组合，并不常见，穿着主体为侍女。这类服饰无疑属于广义的汉服系列，由于褙子(或“背子”)是典型的宋文化符号，具表明其有较强的标识性，故表明其和北宋中原地区〔图九：4〕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三 服饰的时代性和等级性

壁画服饰的时代性往往以墓葬本身为载体，厘清墓葬的时代关系是讨论服饰时代性的前提。关于辽代的墓葬分期研究，以王秋华、杨晶、徐苹芳、李逸友、冯恩学、董新林以及刘未的论著最具代表性。本文拟采用董新

林的四期说^{〔1〕}，将大同地区辽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916—947年)：机车厂辽墓；第二期(947—983年)：许从赙墓、周家店墓；第三期(983—1055年)：南关M2；第四期(1055—1125年)：东风里墓、西环路M1、新添堡村M29、卧虎湾M2、卧虎湾M6、十里铺M27、十里铺M28。

〔表九〕大同地区辽壁画墓年代

墓葬名称	纪年	服饰组合	年代判断依据
机车厂辽墓	第一期	B类男服、E类女服	简报根据墓葬形制和喇叭形器的流行时期判断
五法村辽墓	第一期	A类男服、B类男服	笔者根据壁画风格、服饰特点判断
许从赙墓	第二期：辽景宗乾亨四年(982)	C类男服、E类女服	出土墓志
周家店墓	第二期	C类男服、E类女服、H类女服	简报根据建筑风格判断
南关M2辽墓	第三期	B类男服、E类女服	简报根据启门图判断
东风里辽墓	第四期	B类男服、D类男服、F类女服	简报根据壁画特点和真容偶像判断
西环路M1	第四期	B类男服、G类女服	简报推测
卧虎湾M2	第四期	D类男服、G类女服	简报推测
十里铺M27	第四期	G类女服	简报推测
十里铺M28	第四期	A类男服、G类女服	简报推测
卧虎湾M6	第四期：大安九年(1093)	B类男服、G类女服	买地券上显示
新添堡村M29	第四期：天庆九年(1119)	G类女服	出土“故彭城刘公墓志”

如果将墓葬年代与上述讨论的壁画人物服饰组合对应起来，那么第一期有A类男服、B类男服，第二期有C类男服、E类女服、H类女服，第三期有E类女服，第四期有A类男服、D类男服、F类女服、G类女服，详见〔表九〕。梳理可知，第一期中主要流行B类男服，第二期主要流行C类男服、E类女服，第三期主要流行B类男服、E类女服，第四期主要流行B类男服、G类女服。由此可见，B类男服是相对稳定的式样，使用时间几乎贯穿辽代始终；C类男服是仅在第二期盛行的一类特殊服饰，在其他各期不见其踪影；E类女服在第二期和第三期都有使用，一度成为大同地区辽汉女服的主流样式^{〔2〕}，其飘逸优美的风格亦有晚唐五代之遗韵；G类女服在第四期出现并风靡一时，从数量上看似乎取代了E类女服的主导地位。

服饰的种类与等级性存在一定联系。服饰的等级性是指古代社会用服饰的式样及搭配区分尊卑贵贱，标示身份地位。封闭的壁画空间内展示的服饰等级系统，除了以王公将相、圣人先贤等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特殊情况，通常以墓主人及其夫人的服饰规格为第一等级，其次以墓主人的下属官吏与亲属妻妾为第二等级，再次以为墓主人日常生活服务的侍从、奴仆为第三等级。由于第三等级涉及的服侍人物数量最多，劳动分工和职业可作为内部身份区别的重要标准。在为墓主人提供宴饮、保卫、侍寝服务的各个环节中，与墓主人的亲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这种身份差异的部分内容还可以从服饰上体现出来，其中发式在区分身份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严格地讲，东风里辽墓中的鎏金铜押印上和墓主人彩绘石雕上的人物服饰不属于壁画服饰的研究内容，而由于在墓葬装饰中隐去墓主人被认为是大同辽墓的重要

〔1〕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第70页。

〔2〕 D类主要出现在许从赙墓、周家店两座壁画墓中，其中许从赙墓是958年和976年的纪年墓，周家店墓简报推测也是早期墓葬，可以大致推测出这类服饰的流行时间。

特征^①，我们暂且无法获取墓主人的服饰资料，故将参照墓主人石雕所着服饰认为D类男服中的一部分服饰等级较高，为墓主人所在的第一等级，该墓主人使用了真容偶像葬俗，而“真容偶像为在一定层面或达到一定境界才能享用，契丹人不用此法”^②；剩余部分服饰在同墓壁画中有不同的分工，职业为侍者或门卫，大概为服侍墓主人的第三等级；据研究，C类男服的使用群体为侍官^③，属于墓主人下属官吏的第二等级。许从赉墓和周家店墓中的人物普遍行叉手礼，研究认为叉手礼有两种功能，其中一种“属于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而来的尊卑之礼，主要体现上级与下级、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层级关系”^④。再参照墓主人许从赉的官爵，“官至上将军兼御使大夫，食邑三百户”，三位主体人物的帽子、袍服、鞋子的组合为此时期标配，但鞋子疑为罕见的侧开口的定制样式，身份不一般；D类男服中一小部分展脚的特征疑似官帽，据此推测其身份可能是下属侍官；第三等级的使用群体最为普遍，劳动分工使得该群体内部存在些许差异。如A类男服、E类女服、F类女服、H类女服的使用人群与墓主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等级较高：A类男服的使用者为出行图的参与者，如马后站立的侍从手里托着一顶笠帽，形制与河北宣化张世卿辽墓和内蒙古库伦7号墓出土者极为相似，被认为是契丹官帽，持帽者更受主人的器重；E类全部是燃灯侍女，这一群体一般为辅助墓主人诵经而存在，种种史料显示佛事活动在辽代汉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⑤，故这类人员的选用是要慎重考虑的；F类、H类中出现花冠、褙子等新颖的服饰元素，且数量极少，或许正是借助与墓主人的特殊关系，北宋主流女服才会出现在侍女的身上，这表明贴身侍女的社会地位应高于一般从事劳作的侍女。而在上述类型之外的B类男服和G类女服，其使用者应为从事普通劳作的侍者，有的甚至出现“牛哥”“大喜子”的题记，等级较低。

四 服饰的文化交流

辽代大同地区是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纵观目前的考古材料，在辽政权的统治下的大同地区，服饰本地传统深厚，契丹文化影响并不是很强，宋文化的浸润更弱。D类男服、G类女服与同时期宣化地区的主流男女服饰大体相同，两区域同属于辽政权西京道管辖范围，有着相似的长城以南汉文化区域传统，且地理位置关系、交通亦便于两地的文化互动；C类男服颇有五代遗风，与92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4位侍官的装束如出一辙^⑥，E类女服的人物丰腴红颊，单髻较高，广袖拖裙，似有唐俑遗风。据研究，襦

① 前揭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第45页。

②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③ 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山西大同市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赉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年第8期，第38、39页。

④ 黄剑波《“叉手”礼图像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4期，第12页。

⑤ 冯恩学《河北宣化辽墓壁画特点》，《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37页。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彩版四、五。

衫扎进裹胸长裙、长裙拖地都是唐代女服的标准样式^①〔图六：4〕，至五代，传南唐周文矩《宫中图》〔图六：5〕和传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六：6〕中女子的装束仍未脱离这一范式，只是整体身体形态更为瘦拔，这类服饰长期沿用，成为后世北方地区女服的经典款式。契丹文化的影响在A类男服、B类男服中有所蕴含，其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男子短袍、髡发上，且短袍比髡发在后世更有传承力，便于劳作的优点使得其在金代男服中出现频次很高，多与黑帽组合出现，至元代仍在延续使用^②；此外，有些身份特殊的侍女也穿圆领男袍，搭配双髻或髡发的发式别有一番特点，可能与契丹人的出身有关；宋文化的浸润则主要体现在F类女服的花冠、H类女服的褙子、D类男服的高檐帽上，墓例标本极少，花冠、褙子、高檐帽(或称东坡巾)在北宋社会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似乎能成为辨别汉人与契丹人族属、身份差异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些元素在向北传播的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一现象还有待更多新的实物资料的发现与解释。

E类、H类两类女服在后世女服体系中被广泛接纳并推广。山西地区发现了一大批金代壁画墓，使我们得以管窥金代女子的着装情况。E类、H类两类各占半壁江山，前者以包髻、襦衫扎进裹胸长裙为特征，并增加了披帛和腰带花结的新元素，偶有凤冠替代包髻，实为前文所列辽代E类女服的改良版，广泛见于大同徐龟墓〔图六：7〕、陵川县附城镇玉泉村金墓、繁峙县杏园乡南关村金墓、平定县城关镇西关村M1^③；后者则以包髻和长褙子为特征，与前文所列H类女服几无差异，见于汾阳市东龙观村金代家族墓地M5〔图九：2〕、汾阳县北郊M5中的启门女子。有趣的是，在绛县城内村金墓中这两类女服并存，壁画中女子包髻的发式完全相同，E类女服有1例人物〔图六：8〕，H类女服出现6例〔图九：3〕，比重很高，女墓主人和侍女都有穿着。由此可见，女子服饰的组合或体系有着固定的模式，褙子和披帛分属不同的服饰体系，花冠和长褙子组合的H类女服是晋南地区的主流服饰，包髻、裹胸长裙、披帛组合的E类女服则为晋北地区服饰的主流，至元代继续流行，山西屯留县康庄村M2〔图六：9〕、运城西里庄元墓中仍能见到披帛和裹胸长裙的踪影。综上所述，辽壁画墓中所见的E类女服数量较多，H类女服数量较少，但它们在大同展露出来的差异逐渐发展为服饰的南北差异。前者的包髻、襦衫、裹胸长裙承自本地的晚唐、五代传统，逐渐成为后世北方地区女服的主流；后者的花冠、褙子创制于北宋时期，为同时期南方地区女服的代表。元代散曲记载了元代女服的南北差异确有其事^④，其识别性特征与E类、H类女服的差异性也大体一致。

① 孙机提出并论证了唐代女装的基本构成：裙、衫、帔，无论丰俭，这三件都是不可缺少的。参见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载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

② 董新林、张鹏主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06—107、136页。

③ 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54、169、175页。

④ 元代女子装束有南北之别，元无名氏散曲〔中吕〕《喜春来 四节》：“冠儿褙子多风韵，包髻团衫也不村，画堂歌管两般春”，其中“冠儿褙子”是南地女子，“包髻团衫”是北地女子。

五 余论

公元938年,“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妣、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大同始划入辽地,但凭借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擢升为辽代的五京之一,“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升为西京”^{〔1〕}。从墓葬现象看,最能显示契丹影响的莫过于多处墓例出现驼车、马车的出行图壁画,却不见契丹葬具和马具。就服饰而言,西京大同府地区的服饰文化面貌仍以汉服为主流,偶见契丹服和北宋服饰元素,契丹髡发业已融入汉式长袍的混搭中,种种迹象表明契丹文化因子的闪现更加自由。纵观契丹人创建的辽政权,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第一个有效管理北方草原地区和燕山以南农耕区域的政治理想,其治国理政的宝典便是因俗而治的国策,即正史中记载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2〕}的统治政策,故没有强制推行西京大同府的契丹化,而是尊重文化间的自由交往,尊重本地区深厚的晚唐、五代的汉文化传统。折射到服饰文化上亦是如此,辽代服饰的总构成是各个区域服饰的集合体,上京地区、中京地区、西京大同地区、西京宣化地区的考古材料显示,不同地区服饰的整体性面貌各有特点,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序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理念在服饰上得以呈现。

附记:本文部分线图由刘海清清绘,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506页。

〔2〕 前揭《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685页。